

文统与政统之间：

康熙乾隆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学精神

◎ 李明军 著

齊魯書社



文统与政统之间：

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学精神

◎ 李明军 著



本书系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成果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统与政统之间：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学精神/
李明军著. —济南：齐鲁书社，2008. 11

ISBN 978 - 7 - 5333 - 2123 - 9

I. 文... II. 李...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清代
IV. K249.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6626 号

文统与政统之间：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学精神

李明军 著

出 版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信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32 开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336 千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2123 - 9
定 价	32.00 元

序

清代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在文学史上有着特殊地位,所有文学样式在这个时期已经齐备,新兴的文学样式也在这个时期达到高峰,所以这个时期是古典文学的总结,又是古典文学的集大成。然而相对来说,清代文学的研究开展得较晚,这当然有很多原因,清代离现代较近,沉淀、梳理需要一定的时间,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还是清代文学现象的纷繁复杂。最先开展的是清代小说和戏曲的研究,而最近一个时期,清代诗文引起了较多关注,从诗学思想的研究,单个作家和单部作品的个案分析,到一个流派、一个地域的文学现象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分体文学史,也有学者描绘清代文学的整体风貌。描绘文学的整体风貌,首先要弄清发展的规律和线索,以及其中所融注的文学精神,而这既需要有文学个案研究作为基础,又需要对整体有所把握,还需要较为扎实的理论功底。

实际上,从文学上说,清代十二帝十三朝,最能代表清代文学精神的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这个时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康乾盛世”,也是文学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个时期,文学家一方面总结借鉴前代,另一方面力求有所创新,正因为如此,才会形成一代之文学。康雍乾时期的文学现象纷繁复杂,仅就诗歌而言,不仅诗人和作品数量众多,而且诗歌流派众多,诗学理论异彩纷呈。清初

诗坛的主流是遗民诗，如阎尔梅、钱澄之、归庄、吴嘉纪、屈大均等人的诗多抒写黍离之悲，风格多激越苍凉。由明臣而仕清的诗人，最著名的是被称作“江左三大冢”的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钱谦益力扫前后七子和竟陵派之弊，兼取唐、宋诸家之长，成为“虞山诗派”的领袖。吴伟业以“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笔，写晚明史事及兴亡之感，被称为“娄东诗派”的领袖，又以“梅村体”而闻名当世。康熙之际的诗人著名者有“南施北宋”，而诗坛主流则为王士禛所倡导的“神韵诗”。另外如朱彝尊、赵执信、查慎行都以诗名于世，其成就与王士禛相比皆毫不逊色，然影响不及王士禛。乾隆时期的诗歌，先有学宋诗的厉鹗别开生面，号为“浙派”领袖。接着乾隆朝的重臣沈德潜倡导“格调”，翁方纲提倡“肌理”说而有所谓“学问诗”，合称“乾隆三大家”的袁枚、赵翼、蒋士铨另开新格局，袁枚更倡“性灵”而开创“性灵派”。曾向袁枚请教诗法的黄景仁，其描写社会不平和个人遭遇不幸的诗歌，兼有“清窈之思”和“雄宕之气”，读起来令人回肠荡气，在乾嘉之际的诗坛大放异彩。

如此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当然有一个发展脉络。李明军的这部著作将风雅诗学的复兴与变异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是有道理的。明朝灭亡后，汉族文人进行文化反思，几乎众口一词，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于思想混乱和道德堕落，希望通过儒学复兴挽救世风，拯救天下，而风雅诗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王夫之严格区分诗与其他文体样式，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以此来导情、泄情，避免匿情、伪情，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黄宗羲也认为诗不仅关乎一人性情，更关乎天下治乱，他的性情诗学就是以此为起点。此后的诗学理论虽然变化多样，但基本上都沿着这个思路发展。李明军以文统、道统与政统的双向互动，诗教和政教的微妙关系，来概括清代前中期文学的发展，很有见地。实际上，不仅文人对文、道与世俗政权的关系有明确的认

识,即使是康、雍、乾三帝也明白诗教对政权的作用,所以康熙帝要求诗文“关乎政教”,雍正帝提倡“清真雅正”,乾隆帝标榜“崇尚雅淳”。

李明军不仅勤奋好学,专业基础扎实,而且善于思考,所以在文学研究中多有创见。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学习研究清代诗歌,学位论文研究的是乾嘉之际的诗人黄景仁,对乾嘉之际诗风形成的原因有独到的见解,受到答辩委员会评委的一致好评。在攻读博士时,研究清代小说,其博士论文《中国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研究》,因资料翔实,对清代前中期小说的文人化问题有自己的创见,受到有关专家的赞扬。工作后,李明军继续致力于清代文学和古代小说研究,其所著《禁忌与放纵》一书出版不久,即获得好评,并受到海外学者重视。2006年,李明军到中国人民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研究的课题是清代前中期的文学精神,所完成的研究报告得到专家组的高度评价。

李明军的这些成果之所以受到好评,主要是由于其中的创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创见来自于独立思考,来自于善感灵心。如他以个体生存与道义保全的矛盾来论述明清之际文人的困惑彷徨,从沈德潜的遭遇入手看乾隆帝的道统观,以世俗功名和个体独立、道义尊严的冲突来解释乾隆时期文人群体的分化,风雅诗教的异化,以及在野文人集团的形成,都是异常深刻的。李明军的这部书中,像这样精到的见解还有很多,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李明军的研究思路既与传统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又不追求时尚,很少用时髦的理论和概念。他只是将文学放到历史中去,将文学写作视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他的这个思路是对的,文学不可能在真空中存活。以前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学就像一个有机体,有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实际上这说的只是文学形式,至于文学思想和精神,是随着世运而变的,而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其精神。

与政统之间：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学精神

由于篇幅所限,李明军的这部书中有一些地方没有充分展开,我希望他在下一部著作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述,我盼望着他有新的著作问世,因为他的学术著作确实与众不同,读起来总是让人有所收获,有所感悟。

叶君远

2008年11月8日于中国人民大学时而园

MULU



绪论 文统、道统与政统: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学精神	1
一 康雍乾时期文化政策之转变与儒理治世政策之确立	/3
二 从理学到朴学的学风转变及其思想史意义	/6
三 儒学复兴与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	/10
第一章 困惑与彷徨:明清之际士人的人生际遇和文化选择	23
一 “归儒”与“惊隐”:遗民诗人文化选择困境的文学呈现	/23
二 “忠恕”与“忠义”:金圣叹才子心态的文化意义	/33
三 适意人生与娱乐至上:李渔的人生选择和文学思想	/44
第二章 回归风雅:儒家诗学体系重构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意义	59
一 王夫之的道统观与比兴诗学的文化意义	/59
二 名教与性情:顾炎武的“天下”观及其学术思想体系内	



的诗学观点 /75

三 “理欲合一”与“情至之情”：黄宗羲的社会理想和文学思想 /85

四 “灵心”和“世运”：钱谦益的人生际遇与儒家诗学体系之形成 /97

五 叶燮：儒家诗学体系重建之完成 /122

第三章 “雅正”：康雍之际的文化政策与文学规范之确立 133

一 康熙朝文治政策之确立与士风、文风之转变 /133

二 “习行之学”与“六艺之教”：颜元学术思想的时代意义和文学表现 /150

三 神韵：顺康之际时代情绪的文学表现 /169

四 醇雅：怀柔文化政策影响下朱彝尊诗词风格转变的典型意义 /197

五 “文统”与“道统”：方苞古文理论生成的文化背景和时代际遇 /217

六 “文运”与“世运”：《南山集》案与戴名世人生悲剧的文化内涵 /227

七 出处之间：查慎行的人生际遇与诗风转变 /242

第四章 江湖和庙堂之间：乾隆时期文人群体之分化与风雅文学观之变异 253

一 乾隆时期的文化政策与士风、学风、文风之转变 /253

二 通经与明道：戴震学术思想体系内的文学观念 /270

三 以文传道：姚鼐古文理论的学术环境与文学传承 /282

四 “不平则鸣”与“神”、“气”、“奇”、“变”：刘大櫆的身世遭遇与特异文学思想之形成 /296

五 格调：沈德潜在政教和诗教之间的周旋 /303

六	厉鹗:个体生存、江湖心态与文学表现 /317	
七	性灵:袁枚人生选择的文学表现与意义 /330	
八	“达我心曲”:清代中叶通俗小说的情志表现与小说观念的鼎新 /362	
九	“风人之致”与“案头文章”:清代前中期戏剧的雅化历程 /381	
十	激楚苍凉变骚音:黄景仁诗歌的文化意义与清代风雅诗学复兴的终结 /401	
结论	文学在政治社会中的另类生存	422
参考文献		424
后记		437

绪论 文统、道统与政统：康雍乾时期的 文化政策和文学精神

康雍乾时期在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而此“盛世”又在最后一个封建政权统治下实现。康雍乾时期亦可称为文学发展之全盛期，在这一时期，不仅传统文学样式得以进一步发展，新兴文学样式亦走向成熟，达到巅峰。文学创作在这短短一百年内几乎重演了近千年的文学发展历程，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因而得以突显。明清易代特别是清朝入主中原，亡国之悲加上民族之恨，使清代初年的汉族文人经受灵魂之洗礼，世运对文学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时过境迁，易代之天翻地覆淡化为过眼云烟，文人自我实现之紧迫和个体生存之困境，使文学呈现多种风貌，而灵心主导其间。乾隆时期考据学之兴起，使学问和文学之关系得到重新审视。

本书之所以将康雍乾时期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目的在于以之为例探讨文学发展之规律。康雍乾时期，朝廷对文化和文学的关注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而这种关注集中体现于文化政策之制定中。除直接干预文学创作外，文化政策还通过对文人生存境遇的影响而影响文学。儒家诗学体系之重建为康雍乾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而儒家诗学体系之重建为明

清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本是汉族文人自发的文化反思的结果,而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使这一重建与政教联系到了一起,使儒家诗学的复兴最后成为政治的组成部分,从而走向了异化,廊庙、山泽之对立由此而形成。

康雍乾时期的儒家诗学复兴,相对于明末文风来说,可以说是文学思想的转型,而这种转型从清初即已开始。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钱谦益等为代表的文学思想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扬弃明代文学思想的浮华、世俗、放纵成分,重新以儒家诗教指导、评价文学创作。后来朱彝尊所倡导的“醇雅”词风,桐城派所倡导的“义法”、“雅洁”,沈德潜对“温柔敦厚”的阐释,如此等等,皆将雅作为审美追求之目标。通俗小说的文人化,戏剧的雅化也是在这一时期最后完成。

对明代灭亡的历史反思所引发的学术思想反思,是儒学复兴之诱因。至清代中叶,更多的文人将精力投向儒家元典的整理,原始儒学精神就在这整理中得以重显。从理学到朴学的学术风气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清朝文化政策的引导,但更重要的是文人在社会角色转换中进行自我调整的结果。文人一方面充满着为儒学元典引发的大济天下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方面又面临着安身立命的困境。这种两难状态在清代中期的诗文和小说中有充分的表现。因此,康雍乾时期的文学精神,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归,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本书以文学个案研究为基础,探讨清代前中期的文学精神与文化政策、社会思潮之关系。文人生存境况和文化心态是文化政策和社会思潮影响文学的重要中介。因为明清易代之际是学术反思和儒学复兴的起点,所以本书也将清代初年纳入讨论范围。

一 康雍乾时期文化政策之转变与儒理治世政策之确立

清朝对中原的统治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得以巩固,应归因于其民族政策,而尤值得注意者为其文化政策。清朝统治者如此迅速地融入汉族文化传统,让人惊异。无论是真心尊崇还是故作姿态,清朝统治者对儒教的尊重让汉族士人看到一线光明。除了博学鸿词科的开设外,清廷给许多知名学者提供了多种接近朝廷的机会。正由于此,随着亡国之悲的淡化,清朝帝王的权威在士人心目中得以确立,一些有名的汉族文人以跪献诗书、受皇帝一顾为莫大之荣耀,而这在明代和清初本为士林所不齿。清代前中期的文化政策,在不断变化之中。清兵入关之初,伴随着武力镇压,思想之压制亦甚为严酷,而占据北京之后,又转而对汉人进行笼络。为表示对汉人文化传统之尊重,祭祀孔子,推崇文教。顺治三年又恢复科举,且于大比之外,举行加科,以增加录取名额。科举以及加科之举行,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本应有很大诱惑力,然在顺治朝收效甚微,因清兵对汉人之杀戮残害,使汉人深怀民族仇恨,而清初对汉人政策之反复,又使汉族文人对清朝政权心存疑忌。

康熙初年,文化政策又转而变得严厉。文字狱之惨烈,加上“通海案”、“奏销案”,几使汉族文人对清朝政权丧失希望。然康熙亲政后,认识到思想征服的重要性,开始有意识地纠正此前的文化政策,在文化领域主动向汉人传统靠拢。除跪拜、祭祀孔子,谒孔庙,与儒生讲解经义等行动外,康熙帝又倡“满汉一体”,废除“各省督抚尽用满人”^①等不成文规定,提高汉族官员之地位。一批理学名臣得康熙信任,对康熙之人格修养和治国之策产生重要影响,最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1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

后促成康熙帝对儒理治世政策之选择，文化层面的民族裂隙渐趋弥合。正是在如此情势下，康熙朝开设博学鸿词科，网罗硕彦奇才，笼络汉族文人，标志着有清一代文化政策之最后确立。而一百四十余位汉族学者集于京城，参加由康熙帝亲自主持的考试，也说明清廷的宽容文化政策取得了成效，汉族知识分子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博学鸿词科对文学之影响甚为明显。以博学鸿词试为界，几乎所有参加考试的汉族文人，其文学创作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发生明显转变。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朱彝尊、尤侗、毛奇龄等，其于康熙十七年前的创作中或感慨兴亡，或诉说怀才不遇之苦闷，而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中式后，故国之思几荡然无存。朱彝尊倡“醇雅”之说，主张以词歌咏太平。陈维崧之词风尚未及转变即去世，而其所开创的阳羨词派因不合潮流而随之衰微。

雍正帝虽亦信佛、道，然对儒家尤其尊崇，因儒家学说有益于教化，从而强化统治：“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①雍正帝追封孔子先人五世为王，至孔庙祭奠，亲自下跪，将孔子诞辰之中祀礼改为大祀，如此等等，皆表达对儒教之尊重。雍正帝敕谕礼部，认为四书文乃检验士子真才实学之唯一根据。雍正帝又下令取消童生复试中“小学”试题，改从《孝经》出题。

雍正朝文字狱案频发，如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查嗣庭科场试题案、陆生柟《通鉴论》案、谢济世批注《大学》案、吕留良案等等。雍正朝前期的文字狱，表面上因文字触犯忌讳而引起，实多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因与年羹尧、隆科多、蔡珩等案有牵连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陆生柟著《通鉴论》

① 《清世宗圣训》卷4《圣学》，台北文海出版社2005年版。

论述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无为而治等问题，被以托古讽今以泄一己之怨怒的罪名而正法；谢济世借批注《大学》对理学提出责难，受到惩治，皆未涉及民族问题。曾静案引出吕留良案后，纯粹的文字狱增多，如进士徐骏因诗中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告发思念明朝、反对清朝。又如宛平县丞吴茂育所作《求志编》，因一篇序文末用干支纪年，未署雍正年号，亦被告发而获罪。

乾隆帝自称“书生皇帝”，既附庸风雅，自诩精通理学，又竭力表现得开明，然乾隆朝文字狱案数量最多，其文化政策外宽松而实严厉。乾隆帝正因为精通汉文化，故产生文化上的自卑，对汉人充满疑忌。乾隆朝文字狱之性质比起前代有所变化，反对清朝、怀念故国而引起的文字案仍占一定比例，然更多案件与民族矛盾无涉，多出于对现实不满而发愤激之语，甚至为本欲以文字邀宠以求仕进却招致无妄祸端。此种变化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士人群体之分化。至乾隆朝，汉族士人的故国之思和民族情绪已趋淡漠，更多士人对功名充满渴望，无机会进入仕途的士人，或怀愤激之情攻讦时政，或寻找新的进身之途。

乾隆帝亦声称“以文教佐太平”^①，下令搜访图书，校勘经史，整理古籍，然其本意实值得怀疑。如四库馆之开设和《四库全书》之编纂，表面上为对文教之重视，对汉族文人之笼络，实又为对文化典籍之清理，大批图书被焚毁，造成文化典籍之劫难，《四库全书》编纂之过程中亦发生数起文字狱案。然《四库全书》对文化的影响又不可忽视。《四库全书》之编纂促成了考据学风，汉学、宋学之争亦因而明朗化。《四库全书总目》“扬汉抑宋”之态度，既为学术现状之反映，又反过来影响学风。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5，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年版。

科举制度对清代中期士风、文风之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为搜罗人才，笼络汉族文人，清朝迅速恢复科举制度。然至康乾时期，因人口急剧增长，士人之数量迅速增加，而科举录取之数量相对固定，导致科举竞争日趋激烈，科场之腐败因而日益严重。同时，因为边疆战争之耗费，加上地方腐败所造成的消耗，至乾隆中期即已出现财政危机，解决此危机的途径之一表现为功名之捐纳，更破坏了科举之公平规则，使得科举之神圣光辉黯然。由于文人将主要精力用于八股文，诗歌创作受到冷遇。而四书文既规定程式，又以程朱对经典之注解为唯一依据，很快丧失活力而走向僵化，明知其于世于时无益而仍致力于此，不可不谓对有志文人精神之折磨，故清初学者有“科举兴而圣学亡”^①之说。正是在此背景下，古文被赋予传承文统之重任，时文与古文之对立成为一种话语表述形式。然在举国上下热衷功名的情势下，古文显然处于劣势，再加上考据学对理学的贬斥，承载道统的文统有断绝的危险。正是在此种形势下，桐城派古文家致力于古文创作，要以古文传承道统于一线。现实功利与永恒价值之分裂，对永恒价值之追求，成为部分文人从事诗文创作的精神支柱。诗文的言志传道作用因而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

二 从理学到朴学的学风转变及其思想史意义

康雍乾时期为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而清代学术尤值得注意者为考据之学，也就是所谓的“朴学”。考据学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明代甚至宋代学术中的零星考据成分，然康熙年间阎若璩、毛奇龄等人的学术研究才可称为考据学之真正开端。考据学之兴起，

^① 郑梁：《郑寒村全集》之《见黄稿》卷1《送王文三之钱塘序》，康熙年间紫蟾山房刊本。

既与明清易代所引发的文化反思和儒学复兴相关，又由于朝廷之引导。多数考据学者声称有为而作，坚信所从事的考据有益于世。^①至乾隆时，民族情感渐趋淡薄，出于个体生存之目的和价值实现之愿望，文人的用世热情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

考据学的风靡程度，今天只能从现存资料中得其大概。普通士人无意也无法进行繁杂而无直接收益的考据工作，大多数考据学者是在官僚或富有的藏书家的资助下才得以开展的，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能够忍受贫困和寂寞，孜孜于考据事业。^②许多士人把经学之外的诗文视为业余消遣，一些原本可以成为文学大家的文人为了考据而放弃了诗文创作。考据学不仅对传统诗文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影响到通俗小说之写作。困窘之生活，怀才不遇之悲慨，浮游不定之人生，使得通俗小说作家与考据学者有着相同的英雄梦幻，因而也有着相同的心灵伤痛。

相对于考据学的辉煌，理学可以说是黯淡无光。虽然康熙、雍正和乾隆帝对理学大力扶持，但实际上是利用多于崇信，一方面尊之为国教，另一方面却又对理学名臣的言行表示怀疑。而理学名臣宣扬的仍然是宋明理学中最为粗糙、陈腐的东西，如纲常伦理、修身养性、天理与人欲、道与器等等，理学真是走到了穷途末路。清廷只是利用了程朱的招牌，而对理学的真精神则加以压制排斥。

实际上，乾隆帝对理学的态度尤值得玩味。宣称为儒学之正统和圣学之标准阐释的理学，为汉人统治的基本观念。程朱理学从“天理”高度肯定君权，将人伦称为天理，又以人伦之父子比附君臣，将君臣上下之分称为定理，为皇权之巩固提供强

① 李葆华：《乾嘉考据学者的理想追求》，《求是学刊》，1993年第5期。

② 袁枚：《答黄生书》，《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